

Book



《穷人的诚信》
第二代格莱珉银行的故事
(孟加拉)阿西夫·道拉
迪帕尔·巴鲁阿 著
朱民 译
中信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穷人其实非常珍视诚信

尤努斯教授献给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

◎葛传红

自古以来,贫困、疾病和战乱就是人类的公敌,成为压在人们头上的“三座大山”,但相较于战争和疾病,对于人类而言,贫穷则是更加难以融化的冰山。根据世界银行2006年的报告,全世界目前至少有12亿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这个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远不是一个和谐的世界。面对穷人的声声哀号,我们更不能轻言这是一个乐观的时代。

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上所有国家的穷人都多于富人。那么,究竟哪些国家应该被定义为穷国呢?印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早在上世纪初叶便说过,“答案在于穷人没有机会获取收入致富的国家就是穷国”。然而,问题在于,穷人在没有任何财产的情况下如何能够致富呢?有一种假设是,穷人能够获得某种援助,这便是全世界所有国家扶贫的真正核心问题,但悲怆的现实却是,发展中国家的扶贫基金往往捉襟见肘。另一方面,与之形成残酷对照的则是现代金融机构(主要是银行)却为大量无法有效增值的货币而发愁,是什么阻挡了它们向穷人贷款呢?关键还是穷人的诚信始终无法有效地落实。

《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

(美)布莱恩·巴利 著
舒小昀 等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年5月出版

两个最为矛盾先锋人物,文学家柯勒律治和哲学家边沁。边沁代表了功利主义的思潮,而柯勒律治则代表了德国式的浪漫主义,两人都对当代以及后世影响甚深。罗素认为边沁的学说,与其说是哲学上的,不如说是政治上的,而在今天看来,柯勒律治也是如此。

哲学家穆勒天才地预见到了两人的时代意义,在《论边沁与柯勒律治》中曾多层次解读与对比两人。他说,边沁对公共事务的错综复杂视而不见到盲目的程度,但因此能够敏锐地显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组织机构中的效率低下和不公正。同时,柯勒律治无视现代社会的积极因素,但却能够展示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生活依靠的所需要的共同的价值和社会纽带。而布赖恩·巴利则指出经济学与社会学路径背后实际都存在某种意识形态,也因此各自存在难以两全的局限性。

哲人云云,把部分真理当作全部真理是最大的谬误。那么,经济学与社会学两种研究路径如果能够最终融合,是否两全其美呢?或者说,目标与意义,谁更重要?布赖恩·巴利没有给出确定性的答案,但是他认为妥协精神在此并不适当。面对一个芜杂多态的现实世界,“更多同样的理论,但更符合实情”无疑将成为最好的出路,这也更符合幸福本源的定义。也许,我们无法影响当下,但是根据辩证论的观点,我们现在对于民主理论任何选择都最终将决定我们最后的现实。

理——也是《穷人的诚信》的作者——迪帕尔·巴鲁阿开始了大胆的试验。他们坚决不对借款人提起诉讼,而是尽一切可能帮助他们克服现实困难,重新安排借款合同。相信穷人的尤努斯和格莱珉银行没有失望,在漫长的重建过程中,与银行失散多年,甚至已经搬离原来村庄的人们回来了,重新和银行续约,归还拖欠的债务。时至今日,格莱珉银行每月还会收到很多早已被注销的债务的还款,有些甚至来自遥远的海外。作者由此断言,穷人珍视自己的诚信,这已经成为被充分证明的结论。

对于尤努斯的所作所为,外界长期以来有个很大的误会,以为他是一位慈善家,对人充满了乐观。可是,这却是一种严重的误解。事实是,这位一生以帮助穷人为己任的人,却从没有对乞丐施舍过一分一毫。相反,他对人性的理解却是悲观的。

早在第一代格莱珉银行时期,尤努斯为尽可能保证贷款安全,便建立了一种近似于“还款保甲的制度”。具体是组织5个以上的同一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贷款者在自愿的基础上成为贷款小组,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相互监督项目实施,相互承担还贷责任,在此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不仅如此,在1984年他们还推出了“十六条村约”。其大意是通过这些社会规章,要借款人保证限制家庭规模、教育孩子、不接受或给予嫁妆等等。这显然是对穷人的某种社会伦理教育,同时也是一种强迫的“移风易俗”的价值观改造。

如果“十六条村约”还是思想保障的话,那么分批付款制度便是制度保证。格莱珉银行规定贷款者必须分期还款,通常在每周都有大批催款人深入农村基层,挨门逐户收取。对于在项目成功基础上按时还款的贷款者,还可以获得连续放款。而对于不能按时还款者,格莱珉银行的员工会去调查,找出原因,对于不能提供正当理由者将不再发给下一步的款项。正如本书的两位作者所说,穷人之所以能按时还款,最明显的答案是利己。因为,对穷人来说,格莱珉银行是最经济和稳定可靠的信贷资金来源,谁也不愿甘冒失去这种选择的风险。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尤努斯可以大声说“穷人一贯是守信的,这并不是出于恐惧,而是因为他们充满智慧”。

所以,我们必须得承认,尤努斯所从事的并不是慈善事业,而是扶贫事业。事实上,格莱珉银行这些年来的业务一直是盈利的。如此说来,尤努斯教授的成功,与其说是“冒险”给穷人送来了启动资金,还不如说是帮他们终结了社会商业制度的歧视,为他们打破了“诚信僵局”,结果便是为他们打开了金融机构的大门。换句话说,尤努斯只是将被大商业排斥在外的“贱民”们收集起来,将他们重新拉回“经济人”的角色,并唤醒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诚信意识”。

这一重大发现,不仅弥补了经济学与行为学领域的长期空白,同时也是尤努斯教授献给这个世界的最伟大的礼物!

目标与意义:谁更重要?

◎采薇

人们为何参加政治活动?或者说,民主意味着什么?

谈及这个问题,以往总会把它归类为一个纯粹政治学科问题,人们已经习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城邦”来开始论述。但是随着上世纪经济学帝国主义的流行,公共选择理论目前已经对民主机制有了长足研究。对于民主的解释,经济学与社会学的路径一直是泾渭分明,但是其中的分野在哪呢?是否存在融合的可能性?

布赖恩·巴利作为一名世界级的政治哲学家,尽管已经有《政治的论证》、《正义诸理论》等大作问世,但面对社会学与经济学交叉纵横的迷团,也跟所有人一样困惑,他动手来回应这一问题的最终结晶,便是这本《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和民主》。他在书中分别考察了经济学与社会学对于民主理论的不同分析框架,梳理了两者的历史传承与内在联系,阐释了民主在不同学科镜头前不同的姿态。这本书虽然不算学术出版物,但是几十年来,却一直一直在论文以及专著中得到广泛引用,成为新经典。

时代在变,进入二十世纪之后,随着核武器、新兴国家、大众媒体的出现,信息剧增,而这一切,也为经济学的公共选择理论上场准备了时机。公共选择学派的创始人,布坎南和塔洛克曾经坦言,公共选择学派的研究方法与领域“简单地说,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公共选择的主题就是政治科学的主题,即国家理论、投票规则、投票者行为、党派政治学、官方政治等等”。

众所周知,经济学的传统基于理性人假设,所以经济人理性地追求目标,目标与手段也可以分离。是否参与集体政治行动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亦是一个理性行为,一切取决于选择性激励,任何参与者都会追问付出的边际效益,人们参加

政治的运动的动机引发的成本收益分析范式成为研究的重点。政治决策产生的公共物品,由于不存在唯一参与者,最大收益者的付出与回报往往不成比例。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公共物品的参与度与收益的理性决策过程。如果一个决议产生的总收益是1000元,一个潜在收益者甲能够得到100元,其他90人只能得到10元。那么甲会认为即使没有其他人合作,付出25元推动这个决定也是物有所值,但是其他人则不一定愿意付出2.5元来博取收益——除非他们认为2.5元可以实现10元的收益。

在巴利看来,经济学的理论属于不证自明的、经济的、机械的、数学的式的理论,他们往往将现实简化为模型,直接而又效率,因此也存在适用性的边界,理论与现实的吻合度始终无法完全证明,比如对于民族认同等就不能完全导入经济学框架。

没有一种理论可以垄断对现象的解释,有别于上诉经济式的民主理论被归为社会学路径,属于“发散的、社会学的、有机的和文学的理论”。由于研究假设甚至前提方法不同,经济学与社会学两种方法从提问开始就分道扬镳,结果也自然各持一端。

从霍布斯经典的自然状态的丛林开始,政治学家就一直致力于解决“每一个人对每个人的战争”,他们对于民主理论的研究则关注于界定民主概念本身,赋予民主一种高尚的价值观,或者说意识形态,其中美国社会学大师帕森斯堪称个中典型。帕森斯着眼于“社会秩序何以形成”,他拒绝霍布斯的威权答案,认为社会秩序受建立在共同价值观之上的内在规范制约,而民主制度则提供了稳定的可能性,隐含一种终极的意义。

经济学脱胎于十九世纪政治经济学,而经济学与政治学的纠缠冲突,甚至可以追溯到那个年代的

“历史的老相好”

从游民史认识今天的世界

◎幽人

从前曾经有过一个武侠小说一统天下的时期,从那些金庸古龙们的小说里,世人认识不少“江湖”和“侠客”。在王学泰先生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里,我们也看到了一个“江湖”,不过王先生说了,此江湖才是真正的江湖,江湖上也有“侠客”,不过通常的称呼是一个不怎么褒义的词汇,叫“游侠儿”,其实是些与社会脱序的游民。这个词在一些讲述晚清、民国时期老上海生活的回忆录里,往往也能看到,正可以作为印证。

但江湖上多的还不是游侠儿,而是普通的在江湖里辗转讨生活的游民:棒棒、挑山工、路边卖早餐的、摆地摊卖书补鞋的、卖菜兜售水果的……今天,有些我们总称为“小摊小贩”,有些我们笼统地叫在了“农民工”的名下。还有一种很重要的,叫游民知识分子,卖唱的杂耍的算命的编故事换钱的……

游民游民,核心就在一个“游”字上,有没有文化并非决定因素。至于游民知识分子,至少都是半个秀才,有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斗争着一个贵族,一个游民;一个绅士,一个流氓。

些还多才多艺,吹弹拉唱样样能来,甚至小说也写。据王学泰先生考证,很多通俗小说如《三国演义》、《说唐》等,都有游民知识分子的身影在里面,只不过后来经过文人们的改造,这些小说就变成了今天这个模样。其实现,在很多写小说、写影视剧本的,揣摩的还是古代这些游民知识分子的思路和作派,比如把历史剧写成草莽英雄传奇,把皇帝写得很有游民味,把宰相写得如同游方道士。

游民处在社会的底层,生活不稳定,又饱受歧视,所以其理想总是“发迹变泰”,比如检破烂捡出个百万富翁来(像报纸上常常报道的),做完乞丐做和尚做出了个大明天子(朱元璋),丽春院里游手好闲的韦小宝混了一顶

鹿鼎公的官衔和七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又比如《水浒传》里的梁山好汉,杀人放火受招安,虽然失败,但毕竟也赐过御酒当过官。可理想终究是理想,现实则大都少不了缺衣少食露宿街头,或者挤地下室一文钱难倒英雄汉的情形。还有一种最可悲的,是游民由其生存环境逼出来的一股游民气,作者称之为“游民意识”,强烈的反社会性,破坏欲,拉帮结派,做事不择手段,狠,残忍,有奶便是娘等等。学者李零在《丧家狗,我读论语》里也有个总结,说这是“苦孩子的悲剧”。

说游民意识,作者先从著名的桃园三结义的故事说起:张飞和关羽,要跟着刘备去打天下。刘备说,我是光棍,生死就我自己,你二人家有老小,恐怕不便。关羽说,那好,我们先各自回家杀了老小;张飞说,自己杀恐怕下不了手,不如你去杀我家,我去杀你家;刘备连声说,对对,作者从古代的典籍里搜出这个故事,意在证明游民意识的确实存在,且这种意识和正常社会的意识形态大不相同。这个故事不仅完全悖于中国传统社会重家庭、惜人命的儒家伦理,

与今天真善美的要求更是南辕北辙。所以作者有个论断,说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其主导人物实际上都是游民,烧杀抢掠,虽然痛快,但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李逵的两把板斧砍下去,砍倒的主要是老百姓。所以反抗秩序的不一定可信,造反的不一定是革命者,梁山好汉英雄豪迈,但鱼肉百姓的事也没少干。

李敖曾在一篇文章里感叹中国传统的源远流长,说我们今天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在遥远的过去找到“历史上的老相好”。学者王学泰先生很欣赏李敖的这个说法,不过他的这部厚重的《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倒并不是从现在往回溯,去追寻“历史上的老相好”,而是从过去往今天梳理,将游士、游侠、农民、流氓、游民、流氓、盗匪……都放在同一个精神谱系里剖析。游士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给了游民以人生指导;游侠的一呼百应、不怕死,是游民仰慕的对象;游民从农民、流氓中来,流氓和盗匪也正是游民中的极端分子。

闻一多曾说过,在大部分中国人的灵魂里,都斗争着一个儒家,一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

(增修版)上下册
王学泰 著
同心出版社2007年7月出版

个道家,一个土匪。周作人也说过一段关于有一个绅士鬼和一个流氓鬼的话。这里的“土匪”和“流氓”,正是游民的典型。杜亚泉对知识分子的贵族和游民的双重性,有很精彩的批评,而写过《流氓的变迁》和刻画了阿Q这个典型形象的鲁迅,更是对“游民意识”有着深刻的警惕。

历史顺流而下,游民意识这些“老相好”,今天还或多或少地活在我们的精神血液里,只不过有时候隐藏,有时候显现。几十年前,鲁迅即说过,中国确也还盛行着《三国志演义》和《水浒传》,但这是为了社会还有三国气、水浒传的缘故。这种情形,王学泰先生称之为“社会的游民化”,这正是今天我们需要加倍警惕的。

■新书过眼

《经济学三人谈》



汪丁丁、叶帆、罗卫东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年8月出版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出品

浙江大学跨学科社会科学中心三位教授,都是经济学学者,但又都被认为是经不大安分的:一位偏好历史、思想,一位偏好科学、直观,一位有严重的“人文情结”,他们在杭州这个一向被视为最理想的做学问的地方固守而坐,谈学论道,核心话题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自主性”。用汪丁丁的话来说,三人谈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发生在转型期的西方学术界的各种前沿观念,而他们关心的焦点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三人都觉得,西方新政治经济学不合中国国情,需要引入新思路。不过,到底什么是“新”,什么是“旧”,并不见界定,也带来一些令人费解的问题。但这样的学术“钓鱼”能激发人们的思考,本身就是学术贡献。

《创新及其不满》

专利体系对创新与进步的危害及对策



亚当·杰夫
乔希·勒纳 著
罗建平 兰花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年6月出版

自19世纪中叶实施起,专利是经济增长进程的引擎,但现在这个进程患了影响巨大的心脏病,20多年来的法律变革正将该系统从一个创新激励器转变为一个威胁创新过程本身的诉讼和不确定性发生器,严重损害创新者、企业的利益和经济增长率。美国两名重要的专利和经济创新专家杰夫和勒纳,对美国法律中这个很少有律师愿意涉入但日益重要的领域作了深入研究,提供了启发性的诊断和令人信服的治疗方法:创造出激励措施以激励拥有有关专利新信息的各方,提供多种层次的专利审查,用法官和特别官员代替陪审团来主持侵权案的某些环节。其实,这也是提高创造力、实现经济增长的一种新方法。

《连胜的艺术》



(美)
罗莎贝斯·莫斯·坎特 著
孙伊 译
中信出版社
2007年7月出版

任何企业、团体、个人都可能被卷入幸运或不幸的循环,当事顺利时,似乎一直会顺利下去,做什么都会成功,事情不顺时,又似乎总也走不出阴影,经济总难以摆脱萧条。导致沉浮的原因,实在就是信心的有无。信心就是一座桥梁,连接着期望和表现,投入、成效。被埃森咨询公司评为“全球最具影响力的50位商业思想家之一”的罗莎贝斯·莫斯·坎特把在革新中工作经验上升为一套关于组织循环和动力学的理论,而用的是什么体育圈队的例子。坎特认为,体育是近乎全球性的资源,也是社会的缩影,蕴涵着很多可供企业领导和管理者借鉴的东西。说到底,人及其相互关系的道理适用于一切竞争;不管是球类比赛、复杂的商业情境,还是个人生活的博弈。

《都市文化中的现代中国》



姜进 主编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年7月出版

传统史学对中国近现代史的阐述基本上没有考虑都市大众文化现象的历史意义,所以是有缺陷的。那么,从都市大众文化的角度我们又可以看到怎样的中国近现代史呢?从许多方面说,这本集子所代表的正是这样的开创性的工作:论题涵盖了自明清到现代中国都市大众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从性、性别、民生、民俗、传媒(报刊、广告、电影、戏曲),甚至公共空间(园林、茶馆)等各个视角展开讨论和研究,以史学的眼光探索都市文化的阶级和性别,都市民生、民俗,和认同关系,大众传媒与都市想象,都市文化空间和网络的构建,政治与革命中的都市文化等一系列问题。